

永远的思念

——回忆我的父亲吕文杰

●吕惜光

父亲已经走了三年多了,这些日子里,我没有一天不想他,也多次想写写他,倾诉对他的思念,但总不敢提笔,不愿勾起心中的波澜,也不想引出撕心裂肺的痛感,担心那已微弱结痂的伤痕再次被撕裂。

我的祖父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他用祖上遗产在老家福建建江创办了一个工厂,并购置了一处将军衙署。由于自己不会经营,他雇佣了别人来管理,几年后便赔光了老本。在我父亲8岁时撒手人寰,留下了中年的奶奶和三个未成年子女。守寡的奶奶为了供大女儿和唯一的儿子读书,将二女儿送去当了童养媳,自己则替别人缝补衣物,挣点小钱。后来二姑不甘心当童养媳,便跑去参加了赴缅甸的青年远征军。大姐读完了高中,而父亲考上了南开大学。

在南开大学就读期间,父亲受到进步思想影响,通过共产党地下党负责人陈起岫同志的启发和引导,阅读了大量有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先后领导了峡间溪社、潜流学会和雷电社等学生社团,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8年,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逮捕了一批革命青年,父亲被选为五位代表之一,前往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并且在雷电社主办的刊物《雷田》上,发表文章抨击反动当局,号召同学们“丢掉幻想,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这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并将父亲列入了“黑名单”。不久,地下党组织通知他必须离开学校,前往解放区。

父亲原名杨靖吾,组织给他的良民证上姓名是吕文杰,并告诉这是他今后的化名。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一直使用党组织为他起的名字,直至去世。离开南开大学后,他先到华北大学学习,后来随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组织科长邢情奎来到龙胜县人民政府民政科工作。1950年10月,他开始担任龙胜县民政

科长兼人大常委会秘书主任。1951年10月,他任集宁专员公署秘书。1952年,他任集宁专员公署工商科长。1956年,因工作需要,他到集宁二中任教导主任兼代理校长,主管学校工作。1958年,父亲因“极右分子”被判刑。在监狱期间,他多次上诉,但都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终于得以平反,他的壮年就这样耗费了。平反后,他先后到集宁二中和集宁人大(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工作。50多岁的他,焕发了第二青春,每日精神抖擞、激情昂扬,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工作和学习上。期间,他受集宁市委委托,主持制定了《1980年—2000年集宁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又受乌盟盟委特聘,牵头研讨乌盟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1991年离休。

父亲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我再次见到他是20世纪80年代。他不沾烟酒,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里,似乎没有别的事可干,无论在什么时候见到他,他总是手里捧着一本书或一张报。那个绿色的小台灯,伴他走过了40多个春秋。他和我们说在监狱里,他又读了几遍《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最让别人不理解的是,他在人大工作期间,通信员因为粗心,给他弄丢了几张报纸,他多次向通信员索要,结果仍不是他想要的报纸,于是给我打电话让我帮着找,我则想方设法地为他去寻那几张丢失的报纸。

父亲很博学,看的书多,记忆力也相当好。我是学中文的,第一次参加《中国青年报》组织的“五四”知识竞赛,答题时,有几句诗想不起是谁的佳作,询问父亲,他总能说准。他七八十岁时仍能给我儿子的各科试卷评分指点。晚年他患了白内障,视力很差,仍坚持用放大镜看报。我常常想,父亲是选错了行,他原本是搞学术研究的料。

父亲始终关心国家大事,电视上的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参考消息》

等,都是他每日必看的東西。新聞聯播若是和吃飯時間衝突,他寧可晚吃一會兒飯,也要先看節目,生怕誤掉一天的信息。他看新聞時,常常還要拿着地圖來比對,因而他對每個問題的講述分析,都具備歷史性、邏輯性。和他談論問題,他能從源頭談起,某年某月發生了什么事,後來又有哪些變化及當前的境況,娓娓道來,幫你捋出清晰的線條。我的次子準備考研時,不同我們夫妻(雖然我們也關注時事政治,但畢竟水平有限),却每天跑去和姥爺商討,父親對於國際國內重大問題走向趨勢的判斷基本準確。他晚年腿腳不便,不能出門,我每周總要去兩次,和他談論國家大事、社會大事、烏蘭察布的發展情況,分享我們對一些問題的感悟。我們在一起常常有說不完的話題。

奇怪的是父親對社會大事的認識很深刻,判斷也比較準確,卻不怎麼會處理身邊的人和事,不會觀言察色,不善變通,更不會連心說假話討好別人。自己怎麼想就一股腦說出來,沒有半點遮掩,有時直得讓人下不了台,為此也得罪了一些人。過後我給他指出,他也诚恳接受。我告诉他,李贻林说过“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但他下回肯定还是会将脑中的想法全盘端出,性格使然,他自己改不了,别人也无奈。

父亲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的言辞总是充满韵律和情感,见解独到,口才出众。集宁二中的资深教师曾向我提及,父亲能够连续讲授数日而内容不重样。1979年,他刚从监狱释放,便在集宁二中和乌兰察布盟师范专科学校同时担任政治教师,这充分证明了他深厚的知识储备和卓越的口头表达能力。我有幸三次近距离聆听他的演讲。其中一次是在他担任二中副校长(兼高中政治教师)时,组织的政治课观摩教学。那可以说是我一生中听过的最精彩的课程。不同于以往教师的照本宣科,他从具体

事例出发,由浅入深,由点及面,逐步展开,最终得出令人信服结论。他的学生曾写下一首诗来赞美他的课堂“《吕老师课堂风采录》:玳瑁花镜中山装,翩翩儒者进课堂。经济理论溯根源,古典马里交织讲。诸家学说辩证看,各派争论风云狂。课堂活跃气氛高,广纳博取厚积章。”

还有一次是我在团委工作时,他已任集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团委书记请他给全市团干作经济形势报告。几个小时的讲演,他不看讲稿,不翻资料,数字随手拈来,语言精炼简洁,铿锵有力,慷慨激昂,极富感染力,极具学者风度。

父亲还非常爱整齐。他看的书报总是齐齐整整摞在一起。他的衣服,分门别类叠放在每一个隔间。他一生只穿中山装,衣服的每一个口袋都放有固定的东西。他住院做手术时,我为他放钥匙,放错了口袋曾遭他数落。搬家时,他会把每一个箱子都标明放置的位置。父亲是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人,看电视、看小说,看到动情处,会泪水翻涌、饮噀不止。讲话时讲到兴奋处也会手舞足蹈、激情澎湃。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还好看闲事。做人原则性太强,灵活性很差,个性中又略带一点天真。

他做事有条不紊,计划性很强,时间观念也很强,差几分钟都不行。他还很注重仪表,穿的衣服虽不贵重,但一定要干净平整。最有意思的,也是我嫂子常提的一件事,父亲85岁在北京医院做结直肠手术时,在进手术室瞬间说的最后一句话,竟是面朝孙媳说:“你要注意把嘴抿紧,张开不好看。”很难想象,这个时候他牵挂的不是钱财,不是生命,而是仪表。

父亲还特别关注儿孙的学习和工作情况,由于历史原因,他无法培养我和哥哥,只能把更多的关爱用在孙辈身上。我两个儿子,初中之后的大小试卷,他都要拿去审阅

评判,老师多给和少扣0.5分的地方,他都会一一标出,并向他们讲出缘由,对孩子的人团入党情况也经常询问。我感觉他嘴上不说,但内心深处是希望孙辈实现他未曾实现的理想。好在孙辈们也比较努力,在他有生之年,他的孙子入了党,成了工程师,两个外孙分别读了硕士和博士,有了更好的发展基础。

20世纪80年代,父亲出狱后,我在包头读书,我们曾有过频繁的书信往来。他在合订信件扉页上写着“这些信,是值得永远珍藏的记录,它记录了我那心爱的孩子的心声,镌刻了她那火一般热烈、海一样深沉的感情。它也是见证,见证了确凿无误的事实:她无愧为我的第一亲人。实实在在是我继续生活下去的重要精神支柱。”他也曾留下一些文字,但他去世后,我一直没有勇气去重温那些曾经依恋的文字,去重看他留下的影集。

2022年1月3日,父亲走完了93年坎坷人生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给他的挽联是:“一身正气留人间,两袖清风随鹤去”“学马列追求真理,丹心永存;为人民身奋斗,磊落光明”。他的学生寄诗一首:“晴天霹雳文星落,忽闻尊师鹤西游。衰哉杏坛失贤俊,塞外学界少慧儒。少小离走人生志,中年波折仕途路。投身报国闯南北,学贯东西壮志酬。”

父亲虽然离世了,但我感觉他仍然留存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他的好学不倦、勤奋敬业仍然影响和激励着我们。



七 绝 · 夏 艳

●冀玉娥

细雨连绵草木柔,东风酝酿绮罗浮。
方期夏日皆新艳,岂料山城最胜游。

看花回·巴音塔拉芍药花基地

●霍跃庭

碱地经年已抛荒,风卷尘扬。
现今延彩翻新页,试绿裳、智蓄春光。
育仙葩芍药,科技开航。

惊叹霞销映夕阳,万蕊飘香。
客迷花径衣沾露,见农工、遽进入箱。
畅销京沪广,恩泽村乡。

暑 夜 听 蝉

●邓嵘

热气蒸腾暑月中,谁怜饮露小鸣虫。
青蝉苦唤声声哑,夏夜沉沉不起风。

教育：让生命成为种子的旅程

●孙金梅 王化



校园里,我拾起一片银杏叶,叶脉间清晰的纹路让我想起那些在教室里流淌的时光。教育,多像一场与生命的对话——不是将知识强行注入容器,而是像园丁遇见种子,懂得每个生命都自带独特的生长密码,需要的只是合适的土壤、阳光和等待的智慧。

曾在乡村小学见过这样的场景:教室后墙的裂缝里,一株蒲公英悄悄探出头,金黄的花盘朝着窗口的方向倔强生长。这让我想起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名言:“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真正的教育,首先要学会“看见”——看见每个孩子身上未被察觉的光芒。

在云南某少数民族小学,老师们发现留守儿童对

银饰锻造充满兴趣,便将非遗技艺引入课堂。当孩子们用锤子敲打出第一朵银花时,眼里闪烁的不仅是金属的光泽,更是文化认同的觉醒。这样的教育,不是用标准化的模具去修剪生命,而是像山间的溪流,顺着地势蜿蜒,最终汇入属于自己的海洋。正如芬兰教育改革的启示:当学校取消统一校服、允许学生自主选择学习项目,孩子们反而在自由探索中找到了真正的热爱。

数字化时代的教育,常陷入“快”的焦虑: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于是用补习班填满童年,用分数丈量成长。但某所乡村学校的自然课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老师带着学生在稻田里观察青蛙孵

化,用一整个春天记录蝌蚪变青蛙的过程;在板栗树下讨论坚果的传播方式,让数学中的概率问题在自然中具象化。这种“慢教育”,需要时间等待根系深扎。

日本筑波大学的研究表明,童年时期有过充分自然探索经历的孩子,成年后创造力指数高出同龄人平均值37%。这让我想起杭州某小学的“无作业日”:每个月总有一天,孩子们可以带着放大镜去校园里寻找季节的痕迹,用落叶拼贴诗行,在操场测量影子的长度。当教育放下功利的标尺,允许生命以自己的节奏舒展,那些看似浪费

的时光,反而成为滋养心灵的养分。

教室的墙壁是有限的,但教育的边界可以无限延伸。深圳某中学的“太空课”上,学生们用VR技术模拟火星种植,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中理解生态学;成都某校的“菜市场经济学”实践中,孩子们通过讨价还价、成本核算,真正懂得了数学在生活中的模样。这些突破传统课堂的尝试,让教室成为连接世界的窗口。

更动人的场景发生在贵州山区:一位支教老师用废弃塑料瓶制作乐器,带着孩子们在山村中演奏《茉莉花》。当城里的学生通过直播看到这一幕,自发组织了“云端乐器捐赠”。教育

的力量,就在这样的联结中跨越山海,它让乡村孩子看见山外的星光,也让城市孩子懂得何为真正的富足。正如泰戈尔所说:“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类传递生命的气息。”当知识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成为照亮生命的火炬,教育便拥有了改变世界的力量

站在教学楼的顶层,看暮色中的校园渐渐安静。操场边的梧桐树下,有个孩子正蹲在地上观察蚂蚁搬家,月光为他的背影镀上一层温柔的金边。忽然想起开学第一天,一个小女孩仰着脸问我:“老师,学习是为了什么呀?”我指着远处的星空说:“是为了让你们像星星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然后闪闪发光。”

